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中国
社会
语言学

2014年第1期

(总第22期)



<http://acs.whhit.org>



商务印书馆

中 国 社 会 语 言 学

2014 年第 1 期（总第 22 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 编



2015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4 年第 1 期:总第 22 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271-0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语言学—中国—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72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SHÈHUÌ YǔYÁN XUÉ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4 年第 1 期(总第 22 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271-0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frac{3}{4}$

定价:20.00 元

目 录

语言战略与政策

- 语言战略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王晓梅 1
-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解读 黄 行 10

语言教育与规范

- 舆情视角下语言教育问题分析 魏 晖 21
- 中英应用语言学期刊中语言教育论文对比 刘艳春 赵 艺 王小帆 32
- 语言文字规范理念若干思考 刘楚群 43

语词与社会

- “领导、南巡、农民工”的社情语义背景分析 戴昭铭 53
- 徐州隐语反切语的结构与流传 于 琴 65
- 青海省一藏族村寨的双语生活 曹红梅 72

汉语国际推广

- 新疆师范大学留学生即时通信工具语言使用调查 梁 云 石 慧 79
- 英国剑桥中文学校对外汉语教师课堂语码转换研究 李 芳 92
- 阿尔巴尼亚首都汉语推广与教学状况调查 董洪杰 110

书评

- 《接触语言学》评介 方小兵 116

CONTENTS

Language Strategy and Language Policy

<i>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rategic Studies</i>	Wang Xiaomei	1
<i>Interpretations on the Present Minority Language Policies of China</i>	Huang Xing	10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Norms

<i>On Problems in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entiment</i>	Wei Hui	21
<i>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pplied</i> <i>Linguistics Journals</i>	Liu Yanchun, Zhao Yi & Wang Xiaofan	32
<i>Thoughts on the Normalizati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i>	Liu Chuqun	43

Words and Society

<i>Analysis on the Semantic Background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Words “lingdao(领导)”</i> <i>“nanxun(南巡)” and “nongmingong(农民工)”</i>	Dai Zhaoming	53
<i>The Research of məʔ-ka Type of Fanqie Talk Bengbu</i>	Yu Qin	65
<i>Bilingualism of a Tibetan Village in Qinghai Province</i>	Cao Hongmei	72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for Chinese Language

<i>An Investigation on the Language Usage in Instant Messaging by Foreign Students</i> <i>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i>	Liang Yun & Shi Hui	79
<i>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Code-switching in Class: A Case Study at Cambridge</i> <i>Chinese School</i>	Li Fang	92
<i>The Research of Chinese Language Promotion and Teaching in the Capital of Albania</i>	Dong Hongjie	110

Book Review

<i>Review of Contact Linguistics</i>	Fang Xiaobing	116
--	---------------	-----

语言战略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王晓梅

提要 本文回顾了语言战略研究在我国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并结合战略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界定“语言战略”的内涵。文章进一步评述了“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指出语言战略思想在语言战略研究领域的必要性。文章也讨论了语言战略研究的具体内容及其层次性,肯定了该研究方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关键词 语言战略;语言规划;语言战略思想

1. 引言

语言战略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语言规划研究与战略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徐大明,2012a),也是我国语言规划学者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的新的研究方向(李宇明,2010a)。这一研究方向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语言规划学科已有的学术成果之上的;同时,语言战略研究的产生、发展与我国国家战略及当今国际局势的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本文将讨论语言战略研究方向的产生与发展,并重点讨论这一研究方向的学科基础与研究内容,探讨语言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层次,希望能引发更多的讨论与后续研究。

2. 发轫

根据现有的文献,最早使用“语言战略”这一名词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研究所。该所于2006年召开了“首届中国语言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一次以“语言战略”给研讨会冠名(张西平,2012:58)。这里的“语言战略”是从汉语国际传播的角度提出的,似乎并未涉及其他方面。此外,“语言战略”的提出与美国的“关键语言”行动似乎相关(蔡永良2011:9;王建勤,2007,2010)。

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也逐步开始重视语言文字的工作,颁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明确提出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方言,并且通

过孔子学院向世界推广汉语,开始建立汉语国际推广的机制。这些都是战略性的语言规划活动,而明确的“语言战略研究”开始于2007年。

语言战略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出现有一系列的标志:首先是2007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规划》,明确将“国家语言战略研究”作为“十一五”期间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指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必须及时研究宏观语言战略,设计落实语言战略的行动计划,提出应对重大语言问题的科学预案”¹。这显示我国已经意识到语言战略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与南京大学共建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揭牌仪式当日也召开了“2007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这次学术会议揭开了语言战略研究的序幕。该中心设立的工作目标包括:(1)提出适应当前形势和我国国情的新的语言规划理论;(2)传播语言规划研究和语言战略研究的新成果,推动有关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3)针对国内外重大语言问题展开研究,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提出政策建议和战略预案,使语言文字工作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²。这所研究中心是我国首个以语言战略为核心研究内容的研究机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我国开始以战略的眼光对待语言问题。之后,该中心又连续举办了“2008国家语言战略学术研讨会”“2009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进一步推动了语言战略的研究。2009年高峰论坛以“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保护语言资源与发展语言经济”“汉语的国际传播”“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国情调查”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徐大明、李现乐,2010)。这样的讨论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有一定的创新性,开启了语言战略研究的新篇章。

在这一形势下,学术界涌现了一批以语言战略为题的论文,例如《跨国公司语言战略研究综述》(于光,2007)、《加强语言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李克勤、朱庆葆,2009)、《语言观的演进与国家语言战略的调适》(赵世举,2010)、《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王建勤,2010)、《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蔡永良,2011)、《外语教育战略问题思考》(孟臻,2013)等。

2012年,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推出了《中国语言战略》集刊,成为我国首部以“语言战略”为主题的学术期刊,为语言战略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发表园地。集刊第一辑设立了6个专栏:特稿、语言生活、语文教育、语言认同、语言普查、国际视野,收录了20篇论文。这些论文基本涵盖了语言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汉语的国际推广、普通话的推广、外语教学、语文教育和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社会系统的变化所引起的语言使用、语言认同、语言本体等方面的变化现象;语言的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徐大明,2012b)。随着语言战略研究的深入,《中国语言战略》在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说语言战略研究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其发展则需要持续不断的科研来

支撑,这包括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两个方面。

3. 内涵

虽然“语言战略”作为一个术语已经引起了语言规划学界的注意,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一术语的内涵并未达致共识。到底什么是语言战略?语言战略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与语言规划的关系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学界还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战略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界定语言战略的内涵。

“战略”一词来源于希腊语“stratos”(军队),其原始含义是:“使用会战来作为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转引自刘强,2012:147),后来泛化之后可定义为“在总体政策统领下为获得竞争优势和赢得竞争而谋划并指导未来实施的总体设计和构想”(刘强,2012:150)。战略绝不等同于政策(Strachan,2005),不过可以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政策上。“战略”的内涵包括以下6点:(1)战略蕴含全局性,(2)战略蕴含规律性,(3)战略蕴含政策性,(4)战略蕴含目的性,(5)战略蕴含系统性,(6)战略蕴含前瞻性(刘强,2012:148—149)。这些内涵同样适合于语言战略,语言战略的制定必须要有全局的视野,要有明确的目的,并且是前瞻性的,语言战略本身应该有规律性和系统性可循,同时它是对国家政策的执行,也是“实现国家政治愿景的途径”。

而“战略研究主在对战略的理论化研究”(陈文政、罗庆生,2012),战略研究最早起源于史学的战争史研究,“二战”后进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开始与社会科学结合,渐渐出现“去军事化”的趋势,现在又广泛应用于商业管理领域。另外,“战略”一词的含义也越来越宽泛,而且出现了“国家大战略”。战略研究也“开始跳脱以军事武力为主要研究议题,出现‘经济战略’‘文化战略’‘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等新兴研究主题,战略研究逐渐向学科化方向发展”(陈文政、罗庆生,2012)。而语言战略研究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是战略研究这一学科的新兴研究内容之一。

蔡永良(2012:171)首先提出了一个语言战略的定义,即“处理语言问题的所有行为举措及其理念可统称为语言战略。它是一个国家或政体根据特定语言理念和需要对语言关系及其问题所作出的总体安排和计划,主要由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两个部分组成”。这样的表述包含两层意思:(1)语言战略是什么,(2)语言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都牵涉到语言战略与语言规划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厘清二者的关系,那么很难准确界定语言战略的内涵。

蔡永良(2012:170)将二者的关系界定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语言战略包含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两大部分”(又见孟臻,2013)。对于这样的表述,我们认为有欠稳妥。语言战略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而是语言规划学的延伸,它始终都是在语言规划的框架下运作,因此不能将二者的关系颠倒。如果一定要以包含关系来描述,那也是语言规划包含语言战略。再进一步看,那二者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提出语言战略有何必要性呢?语言战略应该是语言规划中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全局考量的战略思想、布局与策划。它并不是一项具体的语

言政策,更不是“处理语言问题的所有行为举措”(蔡永良,2012:171)的总和。

我国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语言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汉语国际传播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呼吁“将汉语的对外传播列入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之中”“将汉语国际传播列入国家战略之中,作为提高和加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张西平,2012:56-57)。这些新课题应该从语言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特别需要语言规划学界的投入和贡献,提出适应我国国情的语言战略思想以指导具体的语言规划工作。

4. 思想理论基础

语言战略研究是语言规划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致力于解决目前语言规划理论和实践所无法解决的社会一体化和语言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对语言规划学科的贡献。如上所述,战略具有全局性、规律性、政策性、目的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刘强,2012),基于战略的这些特性,其相关研究需要统观全局的战略思想做指导,语言战略也不例外。语言战略思想可统领具体的语言规划方案与活动,体现国家特定时期内的治国理念与发展策略。它与其他领域的战略研究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致的,例如,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原住民语言教育就是“同化战略思想”的体现(蔡永良,2010)。

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语言规划学界提出了“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思想(徐大明,2012a)。这一思想以社会一体化为前提,支持语言多样化,摒弃强制性的语言同化,符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

“多语共存”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多语格局”(蔡永良,2011:11)。事实证明:“去政治化的语言政策适合多语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力量可以推动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语言多样化与和谐、发达的经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或对立”(徐大明,2012a:6)。“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反对语言同化,承认不同语言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群体的语言权利,支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濒危语言,发展多样化的语言资源(李宇明,2010a)。其实,我国的语言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理念,积极呼吁“建立一种母语和国家通用语言和谐共处,多语种并存并用、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和谐语言关系”(孙宏开,2012:11)。

“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思想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理论有:“言语社区理论”(徐大明,2004)、“语言交换理论”(徐大明,2011)和“语言经济理论”(Grin等,2010,徐大明,2010,李现乐,2010)。

言语社区理论以“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和社区“五要素”(地域、人口、设施、互动与认同)来界定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言语社区,并进一步提出言语社区是语言规划的基本单位,语言规划的基本目标应该是言语社区的建设(徐大明,2004)。鉴于目前多数的言语社区都是多语社区这一事实,“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思想就具备了现实性,它正视言语社区的多语性质,提出合理规划多语社区的语言资源配置、互动模式与认同建设,通过建设言语社区最终达到规划语言的目标。言语社区理论从宏观上奠定了语言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后

续的研究可选取特定的言语社区展开微观的实践探索。

语言交换理论认为:语言交换是社会交换的一个层次,不对等的语言交换可以通过非语言方面的补偿来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交换的公平(徐大明,2011)。这一理论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可以很好地应用到二语习得方面的战略研究,有效地规划我国的外语和二语教学。我们必须承认某些人为二语习得付出了额外的成本,这些额外的负担应该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具体到少数民族地区,与其让他们耗费时间学习外语,不如提供更好的条件学习汉语或者当地方言;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也应该相应地学习少数民族语言,这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做法。

语言经济理论强调语言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应用,该理论引进我国后,发展出适应我国国情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发展语言经济,促进语言就业,拉动语言消费”的理论观点以及“提升语言服务,发展语言产业”的学术理念(徐大明,2010;李现乐,2010)。该理论运用到语言战略研究领域体现在它提供了一条解决经济发展与语言多样化矛盾的现实途径。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语言经济,既可以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又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是解决少数民族语言保护问题的两全其美的做法。

以上3个理论构建了语言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多语共存、和而不同”语言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石。言语社区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语言战略的研究对象问题,语言交换理论为语言战略思想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语言经济理论为语言战略研究找到了现实途径。

5. 主要内容

语言战略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明确了语言战略思想和理论基础之后,有必要界定其具体研究内容。我国的一些学者已开展了相关讨论,例如蔡永良(2011)指出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是实现语言战略的主要途径,但是他并未明确界定语言战略研究的具体内容。

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来说,语言战略研究首先要处理好我国不同语言之间的战略关系:包括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汉语与外语的关系等;其次要根据总体战略的需要和布局,研究包括语言发展建设、规范使用、保存保护等不同的资源配置战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目标和任务的战略调整建议等。

处理语言之间的战略关系首先要提出符合当前语言形势的战略思想,承认多语社区的语言现实,承认不同语言群体的语言权益,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发展母语平等的语言政策(徐大明,2013a)。这样的战略思想不仅适用于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也适用于处理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以及汉语与外语的关系。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各地方言、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沟通、文化以及认同功能,承认母语人权、母语平等的基本立场;其次,我们也应该承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非母语教育以及我国的外语教育(主要是英语教育)并没有经过缜密的成本收益计算,也未遵循语言习得的规律。针对这些失衡的语言现象,徐大明(2013)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语言政策,主张减少没有互动机会的语言的学习,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减少外语教育的财政投入,改变“全民学英语”的无序状态(蔡永良,2011;

14)。这样的战略布局不仅能获得社会、民族和谐的政治效益,也能靠发展语言经济收获一定的经济效益。

语言战略研究应强调言语社区的重要性,因为语言的习得和规划都以言语社区为依托,脱离言语社区的语言学习往往事倍功半。原一川等(2013)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儿童的汉语和英语成绩都不理想,这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缺乏汉语和英语互动的言语社区。在语言战略视角下,应该鼓励学习当地言语社区内的语言。那么,云南跨境地区少数民族除了学习自己的民族语之外,应该学习泰、缅、老、越、柬语,减少英语的学习,这样才符合语言习得的规律,也避免付出过多的语言学习的机会成本。语言战略视角下的语言规划应以言语社区为基本单位,在充分了解社区语言资源后,合理规划不同语言的地位与功能,这里的地位包括语言的经济地位与价值。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少数民族言语社区和汉语方言社区的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发展语言产业和语言服务来提升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经济地位,也可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如美国军队的外语能力补贴,王建勤 2010:9)鼓励民族语和方言的学习。

6. 层次

我国的语言规划学者将语言生活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级,分别涵盖(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生活、领域、地域语言生活、个人与社会终端组织的语言生活(李宇明,2012b)。这种层级性的分类也适用于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战略层级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它也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近年来,语言战略又延伸至微观层面,关注个人、家庭、企业的语言规划(李宇明,2012b)。国家层面的语言战略对微观语言战略的安排有直接的影响,而微观语言战略是宏观语言战略的直接产物。

语言战略最早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的(王建勤,2007,2010),是对美国“关键语言”计划的回应,因此基本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考。这个层次的语言战略从国家利益出发,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要(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配置国家语言资源。近期我国学者又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的概念(李宇明,2013),即“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包括国家掌握的语种、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地位、国家现代语言技术发展水平、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公民语言能力等内容,这些都是宏观的战略思考。这个层面的语言战略还包括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张西平,2012)。孔子学院过快的增长速度以及某些具体的教学操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周明朗,2009;蔡永良,2011;陆俭明,2013等),孔子学院的模式是否具备战略性,是否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是否充分考虑了国际社会的反应,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国家层面的语言战略还包括如何协调和处理普通话和海外华语的关系(李宇明,2012a),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郭熙,2004、2006;李宇明,2010b),但是尚未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按照“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普通话与海外华语之间的差异,应该以更大的“华语”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区的语言(徐大

明、王晓梅,2009)。

语言战略也包括微观层次上的个人、家庭和企业等在国家总体语言政策下为取得竞争优势而谋划并指导未来实施的总体设计与构想。在语言规划领域,这对应个人和家庭语言规划(徐大明,2013b;Spolsky,2009)。微观层次上的语言战略与宏观的语言战略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也要决定习得哪种母语、习得哪些外语、怎样习得这些语言等问题。而个人、家庭和企业是否能制定合理的语言战略取决于个人的语言意识。语言意识指的是“人们对某种语言和普遍语言的认知、对一种语言能做什么和应当怎样使用语言的认知”(李巍,2012)。语言战略视角下的语言意识首先要建立语言资源意识,认识到“儿童的第一语言习得能力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成人的第二语言习得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生命资源,社区的语言环境是个人语言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族的语言文化有赖每个成员的维护和支撑,国家的语言地位与国人的地位和发展息息相关”(徐大明,2013b:32)。其次,要建立语言的经济价值意识:“正确地评估语言投资、语言投入、语言消费、语言产品的购置和使用、语言服务的享用以及个人语言能力作为公民语言能力的规划和提升”(徐大明,2013b:33)。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与其语言意识密切相关,语言意识水准不高将导致语言能力低下,反过来,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低下意味着他的语言意识不强。语言能力和语言意识共同构建了一个人的语言素质,而语言素质又是人口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大明,2013b:26)。

宏观与微观的语言战略应该协调一致,个人的语言发展应该与国家的语言目标相结合。国家在制定语言战略时要把提高公民的语言素质(包括语言意识和语言能力)纳入其中,相应地,个人和家庭在制定语言战略时要充分考虑社区、国家的语言需要和资源,同时也要把语言认同的因素考虑进来(郭熙,2012),真正实现语言和谐的总体目标。

7. 结语

近年来兴起的语言战略研究是语言规划学在我国的延伸与发展,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回顾了这一研究方向在我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界定了“语言战略”的内涵,分析了“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语言战略思想及其理论基础,并指出了语言战略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层级性。面对新时期国内外的多语发展趋势和我国复杂的语言关系,语言战略研究既能从国家层面上对语言进行总体规划与设想,也可延伸到个人或家庭层面,具体指导公民或机构对语言的战略思考。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母语平等政策是一项可取的国家语言战略,而提高公民的语言意识是制定个人、家庭或企业语言战略的先决条件。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语言战略的研究将越来越重要。当前形势下,面向国际的汉语推广战略和面向国内的语言教育战略都是研究的热点。面对当前的语言问题,重要的是能够转变语言观念、依据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相关的政策。目前,语言多样性的观念已被普遍接受,而低效、缺乏社区依托的语言教育也开始遭受质疑,这些现象预示着我国的语言战略也将作相应的调整,而语言战略研究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

附注

1. 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27/info28127.htm>.
2.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chinalanguage.net/>.

参考文献

- 蔡永良 2011 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外语界》第1期,8—18页。
- 蔡永良 2012 语言战略视角下的语言教育,《中国语言战略》第1辑,170—178页。
- 陈文政、罗庆生 2012 战略研究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国际关系第五届年会”(台中: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2012年10月6日)论文。
- 郭熙 2004 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2期,56—65页。
- 郭熙 2006 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语文研究》第1期,13—17页。
- 郭熙 2012 关于语言规划中贯穿国家认同建构意识的问题,载徐杰、周荐主编《澳门语言研究三十年》,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3—21页。
- 李克勤、朱庆葆 2009 加强语言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汉语学报》第1期,11—14页。
- 李 嵬 2012 谁、为什么和怎么样保持或放弃使用哪种语言——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中国语言战略》,第1辑,78—82页。
- 李现乐 2010 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经济问题》第9期,25—29页。
- 李宇明 2010a 《中国语言规划续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 2010b 《全球华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 2012a 全面认识语言性质,科学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中国语言战略》第1辑,1—7页。
- 李宇明 2012b 论语言生活的层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1—10页。
- 李宇明 2013 国家的语言能力问题,《中国科学报》2月25日第7版。
- 刘 强 2012 战略的本源内涵与现代寓意,载宋德星主编《战略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141—153页。
- 陆俭明 2013 汉语国际传播中的几个问题,《华文教学与研究》第3期,1—4页。
- 孟 臻 2013 外语教育战略问题思考,《现代企业教育》第6期,113—114页。
- 孙宏开 2012 关于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加强羌语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意见,《中国语言战略》第1辑,8—11页。
- 王建勤 2007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国际汉语教学动态研究》第2期,9—17页。
- 王建勤 2010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2卷,第2期,7—11页。
- 徐大明 2004 言语社区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18—28页。
- 徐大明、王晓梅 2009 全球华语社区,《吉林大学学报》第49卷,第2期,132—137页。
- 徐大明 2010 有关语言经济的七个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2卷第5期,7—15页。
- 徐大明、李现乐 2010 珍爱语言资源,发展语言经济——“2009国家语言战略高峰论坛”纪要,《北华大学学报》第11卷第1期,32—36页。
- 徐大明 2011 语言经济与“语言不经济”:初步的理论探索,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19届年会(2011年6月11日—13日,南开大学和天津市语言学会联合主办,在南开大学召开)。
- 徐大明 2012a “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中国语言战略,载徐杰、周荐主编《澳门语言研究三十年》,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12页。

- 徐大明 2012b 《中国语言战略》第一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徐大明 2013a 母语平等政策的政治经济效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1—6页。
- 徐大明 2013b 语言能力、语言意识和语言素质,李向玉主编《澳门语言文化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6—37页。
- 于光 2007 跨国公司语言战略研究综述,《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118—121页。
- 原一川、钟维、吴建西、饶耀平、范庆江 2013 三语背景下的云南跨境民族外语教育规划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18—25页。
- 张西平 2012 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中国语言战略》第1辑,56—62页。
- 赵世举 2010 语言观的演进与国家语言战略的调适,《长江学术》第3期,124—131页。
- 周明朗 2009 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全球化与美中两国的多语(教育)战略,《暨南学报》第1期,45—56页。
- Grin F., Sfreddo C. & Vaillancourt F. 2010. The economics of the multilingual workplace. London: Routledge.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chan H. 2005. The lost meaning of strategy, *Survival*, Vol. 47, No. 3, 33—5.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rategic Studies

Wang Xiaomei

Abstract Linguistic strategic study is a new field of study, which combines language planning studies and strategic studies. It is a new research dimension proposed b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planning based on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this new research dimension is not coincidental but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rategic study is associated strongly with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strategic study and discusses it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contents. Moreover, the hierarchy of linguistic strategies will be discussed, which aims to bring about more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words linguistic strategy, language planning, linguistic strategic thoughts

(王晓梅 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院)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解读^{*}

黄 行

提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近 20 年来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与发展状况和相应的民族语言政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依据我国政府最新的关于民族语言的文件要求,将当前国家调整和实施新时期民族语言政策规划的内容概括为:(1)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2)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3)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4)开展语言国情调查,并对这些新的民族语言政策做了具体的解读。

关键词 民族语言政策;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现代化;语言国情调查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民族认同的标志,我国保留多样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国家的宝贵资源。目前我国仍在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大约有 130 种,现行的少数民族文字约 30 多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约有 6000 万(孙宏开等,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形成了国家和民族地方少数民族语文管理、教学和科研的事业体系,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总体上是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即“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 7 项“民族地方自治权”之一(国务院新闻办,2005 年)。根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1)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2)民族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依法使用民族语言文字;(3)学校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或进行双语教学;(4)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5)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提供帮助,创造条件;(6)大力培养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人员;(7)司法程序中对民族语文的使用,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政策规定的具体内容(金星华等,2005

^{*} 本文曾在“第九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研讨会”上宣读。

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及中国近 20 年来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特点或许也是缺陷,就是比较追求效率而可能忽视公平或平等,因为如果是公平地追求效率,就应该有平等的规则和起点。但是在事实上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在获得效率的规则和起点并不平等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应该享有适当的优惠政策,以补偿其获得“效率”的“公平”。目前国内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一定程度也是反映了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思考。

无论是当前仍在执行的国家民族政策还是民族语文政策,都是计划经济背景下制定的,因此都必然会存在新体制下重新适应和调整的问题。以国家语言社会生活为例,我国绝大多数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信息是靠汉语文产生、传播和运用的,因此社会交际效率最高的语言工具无疑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文处于绝对的弱势和劣势。而信息技术、互联网等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加大汉语文和民族语文之间的差距,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人口越来越少,使用功能越来越弱,有些甚至趋于濒危。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在国家语言社会生活领域即面临着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方面少数民族需要尽快掌握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在市场机制体制下平等地获得诸如经济收入、接受教育、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卫生保健、居住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等与“社会效率”有关的语言权利;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应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国家制订的倾斜性民族语言政策,以使少数民族在区域自治、母语文化传承和语言群体认同等方面获得与“社会公平”有关的语言权利。

针对当前我国民族语文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家民委 2010 年 5 月发布了《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办公厅 2012 年 7 月印发的《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中,规划了(1)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工程;(2)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与保护工程;(3)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程;(4)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程等旨在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民族语文规划项目。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也被列入中国教育部国家语委 2012 年 12 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以下称《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中涉及民族语文中长期事业的发展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2)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3)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4)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5)各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记录和保存。

根据上述我国政府最新的关于我国使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文件内容,当前及今后中长期民族语言的政策调整和发展规划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新时期的民族语言政策规划任务,既一如既往地贯彻了从实际出发的分类指导的原则,又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家民族语言使用发展的时代特点。比如加大“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力度,可以使少数民族在市场条件下更好地享有上述与“社会效率”有关的语言权利;“科学保护各民族语

言文字”则强调对于民族文化载体和多样性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所以主要是针对处于濒危状态下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旨在对传统文字并保持一定语言活力的民族语言,为适应信息社会使用发展的需要,开展语文现代化的规划工作;“民族语言国情调查”是为了制订和调整新时期国家民族语文政策法规获取必要的政策咨询和科学依据,而开展的基础性调研工作。

1.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

中国《宪法》及相关法律历来都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这是一项基本国策。2000年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此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包括汉语方言地区,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全国范围,也就是说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各民族之间共同的族际语言文字。

虽然经过1950年代以来50多年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通用程度已大大提高,但是和世界发达国家及台湾地区的多语社会通用语言的普及程度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民族地区既使用发展民族语文,又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双语制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语言生活重要的知识信息交流传播工具,我国绝大多数现代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知识信息是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产生、传播和应用的,所以不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无法平等和充分地参与国家社会生活。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工作早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已基本完成,而在我国汉语方言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还远远达不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应有的水平,因此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和任务,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少数民族还可以通过民族语—汉语的双语形式在学习掌握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面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根据《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到2020年,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达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要求,完成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我国目前的国家语言状况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正在引起国家宏观语言政策的调整。例如,在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党代会文件中,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的决定中对语言文字事业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前半句话的对象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政府一贯的“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语言政策没有变化;而后半句话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同时也包括弱势的汉语方言),与